

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 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

熊良智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屈原身世事迹的怀疑,并非起自近代,早在宋代就产生了。但是,宋代学者也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只是源于一种现实的理智兴趣和道德的社会需要。面对民族危亡、人生危机,在疑古思潮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的价值人生的重新审视和着眼现实人生的学术精神。

关键词:屈原;宋代士大夫;疑古思潮;人生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5-0066-07

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生前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但是他的事迹也直到汉代才有所载述。从贾谊的《吊屈原文》和刘安的《离骚传》,尤其是史家司马迁的《屈原列传》,我们可以看到屈原身世命运的基本轮廓的一致性。屈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由于党人谗言,楚王疏放,最后,屈原不忍国家破亡的历史命运,理想破灭,自投汨罗而死。可是,屈原的身世事迹却遭到了后世人们的怀疑,最极端的是,否定屈原的存在。这在学术界曾引起过激烈的讨论,最后竟发展成了国际学术界讨论的话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屈原问题的讨论[1]。其实这场争论由来已久,而且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最早的发难者并不在近代,而是宋代就开始了。不过,他们并没有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只是集中在对屈原是否投汨罗而死的问题上。笔者在这里并无意讨论事件真相,因为历史事实本身是很清楚的,值得研究的是,对汉代以来从未受到过怀疑的屈原身世事迹,为什么到宋代遭到了怀疑,而怀疑的人并不是一家一言。是提出这些怀疑的人无知吗?不是,他们多是

宋代历史上有名的士大夫,而且是著名的政治人物、学者。历史哲学告诉我们:

历史知识是对确定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是由过去给予的,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则是由现在——由我们现在的理智兴趣和现在的道德和社会需要——所提出和支配的。[2](226页)

对历史存在的事实的怀疑,本身是一种问题的提出,我们感兴趣的正在这提出的问题上,因为我们并不怀疑“过去给予”那些士大夫确定回答问题的“历史知识”。

一 屈原事迹疑问的提出

汉文帝时的贾谊在谪贬长沙,途经湘水时,写了《吊屈原文》,咏叹屈原“自沈汨罗”,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也叙述屈原赋《怀沙》以后,“于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汉人的这些载述,被宋代人斥为“此乃祖来传袭之误”[3](248页)。代表人物李壁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李焘的儿子,曾任宋宁宗时参知政事,后又兼知枢密院事。而同为理学的代表人物,宋理宗时也曾金书枢密院事的资政殿大学士

收稿日期:2004-06-25

作者简介:熊良智(1953—),四川金堂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魏了翁,对李壁的观点亦表示欣赏,说:“又闻李季章说屈原未尝投水,盖将从彭咸之所居等语,有此语而实未然也,虽新奇亦有此理。”[4]在他所著的《经外杂钞》中还将李壁于《王荆文公诗·闻望之解舟》下注语中有关屈原投水事的诗、文全部抄录。而据《宋元学案补遗》另附所载的林应辰与兄林拱辰,他们以“淳熙武举换文登第”为“同榜进士”,所著有《骚解》,或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所载《龙冈楚辞说》,亦有相同观点。《直斋书录解题》著录《龙冈楚辞说》一书时说:

永嘉林应辰涓起撰,以《离骚》章分段释为二十段,《九歌》《九章》诸篇亦随长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于汨罗,比诸浮海居夷之意,其说甚新而有理。[5](436页)

其时,还有曾任过宋孝宗时参知政事的范成大,又于乾道三年作有《三高祠记》一篇,用另一种表述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说:

然屈原既从彭咸,而桂丛之赋犹招隐士,疑若幽隐处林薄,不死而仙。[6](92页)

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否定投汨罗事,但云“从彭咸”、“不死而仙”,实际也是在否定“自沈汨罗以死”的看法。

宋代士大夫们的这些否定,也就是对屈原身世事迹的怀疑,并没有强有力的历史证据。甚至没有看到他们充分展开的论证。只有李壁在《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一书中的《闻望之解舟》注中,自称“尝题诗,辨正”,但是他的辨正也主要是从屈原作品理解出发的。

首先,李壁认为屈赋中追随彭咸是一种假设之辞,只是一种面对困境的设想,并没有去真正实现,从而对汉代以来有关记载屈原身世事迹提出异议:

所言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章句》所载吾亦葬江鱼之腹中,此亦乘桴浮海之意耳。孔子岂遂入海不返,太白亦何尝有捉月事乎? [3](250页)

他还认为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以来关于《怀沙》为屈原绝笔的载述也是不可信的。他又说:

且世传原沉流,殆与称太白捉月无异,盖平《怀沙》既作之后,文词尚多,岂真绝笔于此哉?

其次,李壁又对屈原一些作品的真伪表示怀疑,他在注语中说:

又言“遂自忍而沉流”,遂,已然之词,原安

得先沉流而后为文,此足明后人哀原而吊之之作无疑也。

在注语的诗中又说:

《回风》、《惜往日》,音韵何凄其。追吊属后来,文类玉与差。

李壁认为《悲回风》、《惜往日》都不是屈原自己的作品,因为“遂自忍而沉流”一类的话,不可能是死后人的话,只能是别人的哀悼之作,而写作的人可能是宋玉、景差类的人。这又涉及屈原作品真伪的问题,在后来楚辞研究中引起过长久的争论,直至当代学术界,仍然没有结束。

最后,李壁还对前人对屈赋中的一些解释表示否定,认为屈原作品中决不含有歌颂伍子胥的内容,他在注语中吟咏道:

子胥固激烈,籍棺鞭王尸。于吴实貔虎,于楚乃枭鸱。大夫视国贼,剝刃理亦宜。詎忍形咏叹,黼藻严彰施。陋儒暗伦纪,解释纷乖离。

在注文中他又说:

三闾同姓之卿,义笃君亲,决不称胥以自况也。《离骚》泛论太康五子,孟坚未见《尚书》全文,指为伍胥,士固哂之。《九章·涉江》言:贤不必用兮,忠不必以。五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此正引(伍)奢(伍)尚而言。王逸陋儒,顾以为胥,又缪(谬)矣。

李壁处在南宋王朝与金人对峙,偏安江南一隅的背景下,保卫国家、恢复中原乃是时代主题,因而对伍子胥自然给予了否定的评价。他批评王逸陋儒,解《涉江》“五子逢殃”为伍子胥,其实是李壁自己的误解,而他指班固解《离骚》“太康五子”为伍子胥,也是一种误读,本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佚文(参班固《离骚序》),可以说李壁的这些解释都是张冠李戴。

李壁的所谓辨正不过如此,不管是对屈原自沉汨罗的否定,还是对司马迁以来的历史载述的怀疑,或者是对班固、王逸等对屈原作品理解的批评,都是一些主观性的臆断,并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有的还由于自己的主观武断,造成张冠李戴的草率结论。而魏了翁表示欣赏,也并没有说出理由。林应辰的《龙冈楚辞说》,书早亡佚,根本就无法见到他的证明,而陈振孙评论他的书是“其推屈子不死于汨罗”,范成大的《三高祠记》论道屈原“不死而仙”,也是“疑若幽隐处林薄”,李壁也称“愚窃怀此久,聊抉

千载疑”。因而将屈原之死比作李白捉月,用了一个表示推测的词语“殆”。既是如此,用“推”、“疑”、“殆”正是说明宋代这些士大夫的观点虽然新奇,甚至自称是抉千载之疑,否定屈原自沈汨罗,都只是一种怀疑,一种主观推测而已。

二 疑经变古思潮的回应

否定屈原“自沈汨罗而死”,怀疑《悲回风》、《惜往日》是屈原的作品,批评司马迁,班固、王逸的观点,这是宋代屈原研究的新课题。这些观点虽然新奇,却又值得思索,因为在并无实证的情况下,却有不少的人要作出这样的推测,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可以看出是宋人对汉代以来传统认识的反思,对传统的价值世界的质疑。而这都源于他们那个深层的时代忧虑。

我们知道,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时代,边患严重。西北有西夏,北方有辽国,后来还有了严重的金人入侵,徽、钦二帝被掳,中原尽失,北宋亡国。南宋退守淮河长江,忍辱求和,称臣纳贡,这可是中原王朝从未发生过剧变的剧变。王安石变法,兴州学,创新经,结果均失败,这对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士人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现实,因而产生了深沉的危机感。尤其是在两宋之际,目睹过靖康之变、北宋亡国的经历,士人们往往怀着更深刻的忧虑。于是,迫使宋代士大夫们对历史进行检讨,对传统进行最深刻的反思,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的审视。

这种反思,首先表现在对传统价值标准的代表经学上,宋代兴起了一个疑经反古的思潮。陆游曾经评价这一思潮说: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以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叙,不难于疑经,况传注乎?[8]

朱熹说:

今人为经义者,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方考官命此题,已欲其立奇说矣。……遂使后生辈,争为新奇。[8](2693—2694页)

“庆历”后,诸生发明新旨,“考官命题”,立奇说,这都是指在政治上变法图强中的表现,到王安石创三经新义,更可以说是为政治革新张本了。其实,朱

熹本人就是一个创新说、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他的《诗集传》对《毛诗序》的驳斥,对《大学》等书的注,也多变古之举。清人皮锡瑞就曾这样评价说:

独于《大学》,移其文,补其传,《孝经》分经传。又删经文,未免宋人习气。而移《大学》,先有二程子,删《孝经》之本胡侍郎、汪端明,则未可尽为朱子咎。[9](264页)

对于宋代的疑古风气,《宋史·道学传》有一段评述: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

既是如此,所以秦汉六朝以来的传统价值都不足论,都是值得重新思考的。因为它们不过属于“颠错”、“幽沉”不明的辩说。

于是这种疑古思潮在屈原与楚辞研究中也充分表现了出来。朱熹在《楚辞集注序》中就鲜明地提出来了,说:

然自(屈)原著此词,至汉未久,而说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盖未能免。

而洪兴祖《楚辞补注·离骚后序》竭力辩驳了古代以来几种关于屈原生死问题的评价后说:

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扬)雄未足以与此。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

司马迁、扬雄、班固、颜之推等人的议论多可议者,这说明不仅是李壁一人的意见,也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意见。于是对汉代人所传屈原史实,当然也可怀疑。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直接表示了不满,他说:

楚为霸强数百年,前后君臣未尝失计。至怀王愚而信谗,暗而自用,空堕张仪之谗,为诸侯笑。秦楚雌雄既分,天下之势始有所归,而楚遂以亡,此其国之大变也。若屈原之明于治乱,智足以扶危定倾,而疏斥不用,谏争莫行,《离骚》之词当为是起。盖五子作歌,三仁自献,文义详略不同,而大指可见矣。迁乃以为困于上官大夫,故疾其君而作。夫一身利害,少自好者不露芒刃,而误解原乎?《国风》、《小雅》虽有

其间取义狭者，若夫“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则浅陋甚矣。圣人何取哉！迁诚贵原，然不足以知之，又习见贾谊赋，论次失序，本末颠倒，后世固相沿论议，至今不能明，可重叹也。

[10](286页)

这就从战国楚、秦之间形势的变化，屈原作《离骚》的动机，包括评价的标准，批评司马迁虽然想推崇屈原，“然不足以知之”，其传贾谊之赋又“本末颠倒”。他们的历史依据是什么？这都表明了宋人的风气。

由此，我们确认范成大、林应辰、李壁等人对屈原沉江的否定，就不是一种偶然的現象了，而是他们反传统、立新说的疑古思潮的必然产物。

三 生死选择的人生情怀

当然，如果这种怀疑只是出于一种疑古的社会思潮，我们只需作为一家之言来看待。事实上，这种怀疑乃是出于一种现实的人生感慨，是宋人面对的一种深刻的历史课题。林应辰、李壁等人否定屈原自沉汨罗，就是否定屈原会自杀而死。生与死当然是人生的一大课题，那么，一个古代的屈原的生与死为什么会那么牵动宋代士大夫的情怀，引起他们的强烈关注呢？根本原因就在屈原所处的秦楚之间的生死存亡的历史形势与赵宋王朝面临的西夏、辽、金的侵扰不无相似之处。而在民族危亡、国是日非的情况下，屈原面对的历史命运同宋代士大夫面临的严峻现实也有着几乎相似的人生选择。而引出这种导向的，就是宋代统治者。《宋史·神宗本纪》载：

元丰六年正月，乙未诏修周汉以来陵庙。

丙午封楚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

宋神宗的封敕，就是为臣下树立了一个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的典型。就是要臣下能够为君王担负起临危赴难的重任，有为了国家、君王牺牲自己的精神。按《谥法解》：“危身奉上曰忠”，要“险不辞劳”[11](42页)。正因为如此，屈原在各地多有庙宇建立。《宋史·礼志》言：

屈原庙在归州者封清烈公，在潭州者封忠洁侯。

这在宋代士大夫中就有强烈的响应。苏轼有《屈原庙赋》慨叹：“苟宗国之颠复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王子朋《题屈原庙》感叹的是“自古皆有死，先生死忠清”。张孝祥也有《金沙堆庙有曰忠洁侯者屈大夫也感之赋诗》。

赵宋王朝的贫弱，积下的严重边患，几乎贯穿两

宋数百年，辽侵边关，金灭北宋，蒙古人最后灭了南宋，国家民族的危亡都是最严峻的现实。素有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士大夫们不得不表示他们的关注。北宋的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12]南宋的陆九渊则道出了其中的生死情怀，说：“然吾人皆士人，曾读《春秋》，知中国夷狄之辨。二圣之仇，岂可不复？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13](457页)而程门弟子杨时更道出了国家破亡与士大夫之间生死攸关的危机，就在金兵日下，徽宗退位钦宗嗣立靖康之时，他曾专对钦宗皇帝说：

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亦任其责。[14](964页)

《宋史·儒林传》描述大儒胡安国之忧虑，可见士林一斑，说：

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见中原沦没，遗黎涂炭，常若痛切于其身。宋代士大夫的这种关注，在楚辞研究中，就表现他们都竭力赞扬屈原忠君爱国的精神，不管他们对屈原的评价有哪些分歧，而在这一点上都是交口称赞的。但是笼统地在精神上的赞扬，已经不是士大夫最关注的了。见诸行事，指导现实人生的选择，才是宋儒的精神。钱穆先生云：

其著精神处亦在实际人事，此乃宋初学风特征，不仅与唐人尚文学诗赋有异，亦与汉人尚章句训诂有别，从此走上了儒学正路。[15]

哪怕是像李壁这样的人，他否定屈原自沉汨罗而死，但仍然赞扬他：

竭节扶颠危。虽抱流放苦，爱君终不衰。

嗚乎义之尽，永世垂忠规。[3](248—249页)

其中生活于两宋之交，而仕于徽宗、高宗朝的洪兴祖是一个很突出的代表。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序》中，完全可以看出洪兴祖不止是在作一种历史人物的评价，而且是在回答一个现实的课题，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之中的士大夫应该作怎样的人生选择。洪兴祖驳斥了班固、颜之推对屈原的评价，又以设问的形式申诉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看洪兴祖《序》中的内容：

或问：古人有言，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屈原虽死，何益于怀襄？曰：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比干，紂诸父也；屈

原,楚同姓也。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

或曰:原用智于无道之邦,亏明哲保身之义,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远害可也。有官守言责,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见危致命,况同姓,兼恩与义,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责,微子去之可也。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后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

这是生与死的选择,洪兴祖是坚决主张尽忠死节的。可是“或问”、“或曰”,却表示着另一种判断。或问所引“古人有言”,证明“或问”乃是当代的质疑和讨论,他们不过借历史上的屈原的讨论,来作出当代的人生选择,洪兴祖也正是针对这种价值倾向而作出的现实批判。朱熹在《楚辞辩证》中的话,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

洪氏曰:“循规矩而改错者,反常而妄作,背绳墨以追曲者,枉道以从时”。论扬雄作《反离骚》,言“恐重华之不累与”。而曰:“余恐重华与沉江而死,不与投阁而生也”。又释《怀沙》曰:“知死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此所以忤桀相而卒贬死也,可悲也哉。近岁以来,风俗颓坏,士大夫间,遂不闻有道此等语者,此又深可畏之。

这正是说,洪兴祖注《楚辞》,论屈原都有现实感慨,这种现实感慨也正有“近岁以来”的现实的背景,乃至洪兴祖自己都因著书中的现实寄托而遭到了贬官的命运。《宋史·儒林三·洪兴祖传》有这样的史实记载:

是时秦桧当国,谏官多桧门下,争弹劾以媚桧。兴祖坐尝作故龙图阁学士程瑀《论语集序》,语涉怨望,编管昭州卒。

但是,朱熹并不完全赞成洪兴祖的观点,他认为洪兴祖评价屈原,不能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去分清“所遭之时”和“所处之位”,而比附殷之“三仁”也不恰当,因为比干、箕子都是“以谏而见杀,见囚耳”,与屈原“捐生以赴死”是不一样的(参《楚辞后

语·反离骚》)。而且,朱熹对屈原自沉汨罗是抱着批评态度,他在《楚辞集注》序中说道:

窃尝论之,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

这就是说,在屈原的实践行为上,“忠君爱国”的诚心是值得欣赏的,这同洪兴祖所说的“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是一样的。然而,朱熹却并不认为值得人们效法,因为“过于中庸”,就不符合朱熹推崇的最高的道德标准“中庸”。他认为“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16]。也就是说,屈原的不足正在于他的“忠”,这个“忠”,并不是朱熹所推崇的最高道德标准的“忠”。他曾经说过“忠”,“只是一个物,但有精粗。众人有众人底忠,学者有学者底忠,贤者有贤者底忠,圣人有圣人底忠”[17](358页)。那么,朱熹所推崇的“忠”是什么“忠”呢?很明显是圣贤的忠。他在《楚辞后语·反离骚》后序里说过:

然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若其为行之不能过……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它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论其细行,而必其合乎圣贤之矩度,则吾固已言其不能合于中庸矣。

也就是说,用圣贤的“忠”来衡量,屈原并不符合圣贤的价值模式。

同洪兴祖相比,朱熹观点的发展变化了,并不只是他个人发展变化,而是他的时代的发展变化,他批评洪兴祖没有分清所遭之时、所处之位,本身是在强调历史条件的变化。他不同意洪兴祖仅仅以“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的观点,也还在强调他们的价值标准有不同。如果说洪兴祖虽然处于高宗南渡之初,还对恢复中原抱着热烈的希望的话,到了朱熹绍兴十八年(1149)进士第,已是主和派占据上风,后来的几代皇帝也只能偏安于半壁江山,维持赵宋王朝的苟安局面,虽然宋孝宗曾经试图有所作为,形势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孝宗淳熙五年,陈亮上书,可以是很好的说明。陈亮上书说:

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与之俱生,卒能以奔败之余,而胜百战之敌。及秦桧倡邪议以沮之,忠臣义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民情矣。[18](《陈亮传》)

摆在赵宋王朝君臣士民面前的一个主题就是,怎样将这个偏安的朝廷维持下去,这恐怕是从宋高宗开

始就确立了国策,并不仅仅是秦桧当政、主战派遭贬的问题。《宋史·高宗本纪》绍兴二十六年,在秦桧死了以后,当时秦桧党徒遭到了贬谪,于是有臣下言对金战事,宋高宗下诏说:

讲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鼓倡浮言,以惑人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自今有此,当重寘典宪。

这种统治思想的实质,就是维持南宋小朝廷的政治局面,延续赵家天子的地位。《宋史·礼志八》曾有宋高宗封敕,祭祀春秋时期晋国程婴等人的一段载述,很能说明宋高宗深层的内在动机:

(绍兴)十一年,中书舍人朱翌言,谨按晋国屠岸贾之乱,韩厥正言以拒之。而(程)婴、(公孙)杵臼以死匿其孤卒立赵武,而赵祀不绝,厥之功也,宜载之祀典,与婴、杵臼并享春秋之祀。

十六年加婴忠节成信侯,杵臼通勇忠智侯,厥忠定义成侯,后改封婴强济公,杵臼英略公,厥启侑公,升为中祀。

显然,这种封赠完全在于程婴等人保护了赵氏孤儿,使赵氏不绝。作为赵宋王朝的宋高宗这样做,不正是在告诉臣下吗?尽忠的最高目的,在于“赵祀不绝”。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朱熹对屈原的死节并不作为最高的道德典范来推崇的原因了。朱熹就明确地表示了这种思想:

朱子曰:忠臣杀身,不足以存国。[14](830页)

宋代士大夫们重视人生行事,不在章句训诂上纠缠,他们讨论生与死必然要考虑到社会的效果和意义,朱熹师门的前辈,程颐的弟子杨时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

若使死可以救世,则虽死不足恤。然岂有杀贤人君子之人?君子能使天下治,以死救天下,乃君子分上事,不足怪,然亦须死得是。孟子曰:“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如必要以死任事为能外死生,是乃以死生为大事者也,未必能外死生。[14](250页)

面对死与生,宋代士大夫已不再只是表示死与不死的简单态度,而是在追问“为什么死”?要追求“须

死得是”了。这就带了形而上的判断色彩。他们表现了更深层的历史责任感,要“存国”,要“求世”。所以他们在士大夫的人生行为上,表现了一种前无古人的气概。杨时的弟子罗从彦这样评论士人的行为,说:

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学者果能明道,则周、孔之习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昼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而汉唐以经术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经术自董生、公孙弘倡之,古文自韩愈,柳宗元启之,于是明道者寡,故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呜呼!学者所见,自汉唐丧矣。[18](《道学传》)

决定死生去就的在于人“明道”,若能明道,死生去就像寒暑昼夜变化一样自然,不值得人们费尽心思去讨论。朱熹以“中庸”的道德价值去衡量屈原,也就是用“道”的标准在评论,这个“道”,又是宋人的孔孟之道。这个“道”远比死生更重要,更具有道德价值,也就是有比死生更高更重要的东西。朱熹自己不是就说过吗:“欲生恶死者,虽众人之常情,但欲恶有甚于生死者,乃秉彝义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为苟得,恶死而有所不避也。”这仍然让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发展中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与阐释的结果。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思考林应辰、李壁他们敢于对汉代以来屈原沉江事实的否定,就懂得了除了疑古思潮的影响,更多的是寄寓了他们自身在民族危亡的时期对待生与死的思考,他们要选择新的人生价值,选择生与死的态度,必然要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否定,而汉代以来传统忠君爱国的臣子形象屈原成了他们最集中关注的反思形象。

因此,透过宋代士大夫对屈原身世的评价,我们看到的是宋代士大夫们在宋王朝经由长期边患,国是日非,以致社稷破亡的历史剧变过程中的人生价值的设计与思考。这既是因为宋王朝与屈原当时的楚国面对强秦、怀王被囚、日益削弱的历史局面有了惊人的相似之处,而面对民族危机、人生危机产生了与屈原相似的人生处境的共鸣与同,从而对历史传统的人生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在生与死、去与留的选择中,对君臣之义的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中作出了重新定位,也让我们看到了宋代士大夫们更加着眼于现实的人生行事所作出的冷静的反思和学术精神。

参考文献:

- [1] 黄中模. 中日学者屈原问题论争集[C].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 [2] (德)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3] 李壁.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4] 魏了翁. 鹤山集: 卷一〇八[M].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 [5]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6] 范成大. 吴郡志: 卷 13[M]. 四库全书[Z].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7] 王应麟. 困学纪闻: 卷八[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5.
- [8] 朱子语类: 卷 109[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9] 皮锡瑞. 经学历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10] 叶适. 习学记言序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 [11] 逸周书. 卷六[M]. 四库全书[Z].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2] 王安石. 临川先生文集[M]. ;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 [13] 陆九渊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4] 宋元学案·龟山学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5] 钱穆. 初期宋学[A].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C]. 台北: 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80.
- [16] 朱熹. 楚辞集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 [17] 朱子全书[M]. 四库全书[Z].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18]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Concern About Qu Yuan's Life and Fate and Solicitude for Scholar-Officials' Life in Song Dynasty

XIONG Liang-zhi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Song Dynasty rather than modern times, there appears a doubt about Qu Yuan's life and deeds. However, it originates only from a sort of realistic rational interest and moral social need, as the scholars at that time do not have verified historical evidence. In the face of the life at risk and the nation's existence in peril, there are a close re-examin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aluable life, and an academic spirit of the real life in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doubt about history.

Key words: Qu Yuan; scholar-officials in Song dynasty;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doubt about history; solicitude for life.

[责任编辑:唐 晋]